



www.cpj.org

中国 为媒体权利论战

中国新闻工作者在抗议受攻击、骚扰和拘捕方面正越来越多的表达自己的心声，有关媒体权利的讨论和中央政府的立场，可能预示中国未来更为广泛的改革前景。

保护记者委员会特别报道 作者 爱德铃 Madeline Earp

方是民是一个著名的科学作家和博客作者。他6月份在福建省度假时，收到一个紧急短信：一个与他合作的记者，在北京受到袭击者挥舞铁棒殴打。方是民立即通过他的新浪微博公布此攻击，他认为，这是对他的同事撰写调查报告进行报复。

他的同事、设在北京的财经杂志科学记者方玄昌说，“像我这个事件如果没有网络的话，其传播可能会很窄。”保护记者委员会7月见到方玄昌时，仍然可见他左耳上方令人生厌的伤疤。他说，方舟子公布的消息，在推动警方真正进行调查方面非常重要。“第二天这个事情已经成了公共事件了。然后他们才开始重新来作了笔录，他们才愿意听。所以我后来想，

这个事件让大家知道还是对警察有一些推动作用的。”

在方是民自己也被两名男子攻击，朝他喷洒化学物后，北京警方9月逮捕了四名嫌犯。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一位武汉泌尿科医生被控精心策划两次攻击事件，以对他们两人在2005年进行的调查报复，此医生认为该调查妨害了他潜在的学术任命。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调查发现，中国新闻工作者越来越愿意代表同事表达他们自己的心声，公开谴责遭受的人身攻击、骚扰和拘捕。保护记者委员会对十多位新闻工作者、律师和分析师的访谈以及对最近五个案例的分析表明，新闻界正在维护媒体权利 -- 如果不是新闻自由的话 -- ，而且至少获得了有限的成功。

除了上述两位方姓人士案中嫌犯被捕外，另一位被居留的新闻工作者被释放，对另一位记者的逮捕令被取消，还有一位公司高层主管在与一家报纸冲突后发表道歉声明，但这些都是新闻工作者公布相关消息后才发生的。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著名媒体分析师展江说，“新闻工作者有组织的抗议行动仍然少有，但是有关新闻工作者权利的报道却在增加。”保护媒体作为一个明显的问题出现，网路新闻和数字传播方式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不过目前限制仍然很大。尽管有关媒体权利的讨论渐聚势头，但审查制度仍然强大；政府严厉限制直接挑战中央政府和共产以及对敏感话题的报道。*中国经济时报*著名调查记者王克勤告诉保护记者委员会说，“由于举办奥运会和庆祝共产党掌权60周年，2008和2009两年的报道自由有大幅度下降。”

同样，国家禁止新闻工作者采访如民族暴乱等敏感话题则一直有效地使得记者和编辑们对

滥用权力反对媒体沉默无言。中国新闻工作者明显没有报道 *维吾尔在线* 编辑海来特·尼亚孜的案件。尼亚孜因对200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边区发生的民族暴乱进行评论，于7月被以反对国家罪名被15年监禁。

数字方法扩大信息

数字媒体和传统媒体互动强化了对媒体施加暴力的报道，*每日经济新闻* 上海记者站7月份抗争后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例证。

在该报报道政府在调查霸王洗发液的产品安全性之后，霸王洗发液一名销售代表和三名员工来到记者站敲打大门并闯进办公室。这次事件导致好几起轻伤，部分情况被录像机拍了下来。*每日经济新闻* 坚定应答，在网上发表了有关此次冲突的特别报道 -- 包括上述录像、霸王事件的数幅影像，一段评论以及引至该报和其它全国报刊相关文章的30多个链接。

霸王和 *每日经济新闻* 都在各自的新浪微博上发表了声明，这些微博在广东的 *南方都市报* 网站上贴出后，由香港的 *东南西北* 网站翻译成英语，广为传播。

@Bawang Shampoo 18:23 从网上获知此消息，我们感到非常震惊，.....

一直以来，我们都非常尊重媒体客观报道的权利。

@NBD

19:14 本报严正谴责用挑衅办法威胁[记者的]人身安全，干预和阻挠报纸的正常秩序和运作。

据当地新闻报道，对此事件的报道远不如他们受到的侮辱，但还是迫使霸王总经理万玉华于8月5号到记者站亲自道歉。

在同一周，新闻工作者对另一起与公司相关的事件作出强烈反应。7月23日，东南部的浙江省警方对北京*经济观察报*的一名记者发布逮捕令，原因是他发表了一系列指控该公司内部交易的文章，损害了造纸商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名誉。新闻报道称，该公司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该名新闻工作者仇子明虽然藏了起来，但仍在其新浪微博上发文坚持自己的立场。

该报立即作出反应，在其英文版的网站上登载声明说，“本报记者仇子明因对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正常新闻报道而被网上通缉,本报深感震惊……，并将利用一切合法手段捍卫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正当采访报道权。”

据当地新闻报道，7月29日，警方已取消逮捕令并作出道歉。管理中国印刷媒体的中国新闻出版局在其网站上张贴了该局出版的报纸*中国新闻出版报*的文章支持记者权利。该文说，“新闻机构对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事件依法享有知情权、采访权、发表权、批评权和监督权,新闻机构及其派出的采编人员依法从事新闻采访活动受法律保护。”

这样的结果虽然是正面的，但还是有局限性。伦敦的*金融时报*称，虽然已经撤销了对仇子明的逮捕令，但警方仍在继续对仇的报道进行调查。霸王的道歉虽然重要，但导致攻击事

件的强烈指责不是由 *每日经济新闻* 发起，而是由香港的 *壹周刊* 发起。*壹周刊* 指称，该公司产品含有致癌物质。（据新闻报道，霸王对此报道有疑义，并以名誉受损提出诉讼。）

媒体权利：有限的趋势

许多中国新闻工作者认为，上述趋势范围广泛但却是逐渐递增的。媒体分析师展江说，与媒体“权利”相比，新闻工作者较少提及具有西方民主含义的“新闻自由”这个字眼。展江在他因暑假而变得冷清的校园办公室说：“我们在中国是不谈自由的，因为自由这个词，”他改用英语并强调说，“highly sensitive（非常敏感）。”然后继续用中文说：

“那我们说什么呢？媒体权利，实际上意思是一样的。”

中央政府最近的一些表态看来有鼓励如商业及地方事务报道等方面媒体权利的意思。

据展江和其他人说，2008年一项有关开放政府信息的规定就加强了公众监督的气氛。该规定将政府可向大众开放的信息分门别类，并规定了获取这些信息的手续，此规定于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提出后生效。国务院是比共产党堡垒的中宣部更能接受温家宝影响的中央机构。据香港大学中国媒体项目计划说，尽管新闻工作者还未广泛运用这项规定，但已广泛地报道了公民对信息的需求，并积极参与有关官员透明度的辩论。

此外在2009年4月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定期审查而制定的“中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政府也好像在促进媒体权利。该计划规定，新闻工作者拥有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和发表权”是受法律保护的。国家媒体也附和这种说法，*人民日报* 网路版8月2日的社论说：“政府要带头尊重媒体记者的监督权和采访权。”

但批评人士说，这些说法只是做秀，以冲淡对例如在全国监禁至少24名新闻工作者等侵犯人权的批评。他们说，为新闻工作者关心的问题提供有限的通路、同时又能转移对政府控制信息政策的批评和注意力，从而建立不多且受国家控制的媒体权利，这对中国政府是有利的。他们说，只要政府继续实行审查制度，迫害批评者，政府对权利的声明就是空洞的。

中国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 (Andrew Nathan)

对保护记者委员会说，“中国政府很久以来一直声称尊重人民的权利 --

但不是人权而是公民权，指的是国家在宪法中给予并在法律中规定的权利，而不是生来有之不可侵犯的权利。在当权者的眼中，在维护这些权利和坚称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就是为党服务，服从中宣部的指示这两者之间是没有矛盾的。总而言之，中国政府使用的‘权利’这个概念就是完全让他们可以有一种行动计划，既能加强对这些权利的保护，又根本不会削弱党的专制独权。”

这种独权反映在新闻工作者不能建立自己独立的专业组织这个事实上。民间社会团体必须挂靠某一政府机构才可以注册在中国开展业务。结果新闻界就只有共产党建立的机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该协会在新闻工作者受到攻击时站出来说话，但其政治地位确有效地使它不能采取积极的行动保护其成员。在接受保护记者委员会的采访中，新闻工作者对这个协会的评价包括冷漠和蔑视等。

政府控制还延伸到对有关新闻工作者定义这一基本问题。只有为官方承认的媒体工作 --

而且每一个媒体单位都必须有一个挂靠的政府机构 -- 才被认为是新闻工作者。

国家审查制度禁止官方媒体报道挑战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问题，使得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只好转到海外或非官方的地方网站上进行，这些“非官方”网上评论者非常易受伤害。据保护记者委员会2009年12月1日的年度调查结果，在中国被监禁的24名新闻工作者中，大多数人都是在网路上发表作品，其中大部分是少数民族或是被认为对共产党统治有威胁的活动分子。

媒体分析师展江还引证了政府另一言不符实的情况。他和其他人指出，温家宝和其他中央政府领导人虽然发表了较为自由的规定和陈述，但他们并未促成支持媒体权利的立法，因为那样做会直接向中宣部挑战，进而扩大到对共产党本身挑战。展江说，“中国在过去30年制定了很多很多的法律，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好事情。但是关于媒体的法律，没有。他们是故意的，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有这样的法律，中宣部就没有合法性。”

情况虽然如此，但许多新闻工作者，甚至包括那些因工作而直接受害的新闻工作者说，媒体权利还是比以前强了许多。方玄昌说，“对新闻自由和西方开放概念的认知都在增”。

2006年因争议文章被撤职的前《中国青年报》增刊《冰点》编辑李大同补充说，“温家宝开始看，他在历史上會留下什么样的名称。中国最高领导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走到那说到那，普世价值、民主、自由、人权。但他搞不了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他没有这个权力。”

推进边界的抗议活动

最近几个月，中国新闻工作者举行了两次有组织的抗议活动，推进政府允许的边界向前移动，两次抗议都涉及在网上发表不满的公开信。在霸王案中，侵犯专业权利的规模相对而言较小。但作者还提到对他们权利更广泛与更有系统的威胁，并暗示牵连其中的政府官员

。虽然审查机关限制对每一封信的讨论，但这两起公开信抗议在业界的影响十分深远。

第一桩抗议活动起因于6月19日发生的事件。当天西南城市重庆的特警队突然查封了涉嫌跟妓女有关系的一家夜总会，这次查封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领导的高姿态反犯罪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薄是前商务部长，被视为可能被提拔到党内最高层的人物。五天以后，北京的经济观察报引述匿名消息来源说，重庆晨报员工因在网上论坛讨论此次查封的政治背景而被拘留。

许多中国记者对可能遭到惩罚忧心忡忡，因此他们通常在网上讨论此类政治背景 – 或者将其传给其它网上评论家 –

因为各种宣传规定不允许他们通过自己的传统媒体渠道报道这些事情。晨报否认警察拘留了他们的职工--甚至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但是新京报后来引述重庆公安局报道说，两名晨报新闻工作者陈宋波和裘晋奕经过盘问后获释，另外一名网站员工廖异还在调查之中。

100多名新闻工作者、学者和其它人员--其中包括一名政府顾问--

很快签署了一封网上抗议信投给重庆晨报。为了减小可能的报复，此信采用迂回的方法传递信息：它不提警察拘留同事的问题，但指责晨报未能给员工撑腰，既不发表有关询问，也不公开回答媒体同事的要求。尽管采用了间接手法，这封信还是清楚地传递了维护新闻工作者“权利”必要性这一信息。这封信说：“固然，在现有体制之下，被侵犯的权利确实难有救济之道，但我们仍然可以以个人身份表达我们的立场。我们可以选择站出来，自己捍卫自己。”

许多人相信此事的影响是直接的。展江说，“该信发表后，这位记者就被释放了。抗议是有效果的”。保护记者委员会访问了三位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新闻工作者。他们要求不要将每一个人的名字列出来，因为签字代表的是一个群体。其中一位指出，这样“他们就不能惩罚每一个人了。”虽然编辑被告知不能报道有关此事的新闻，但也没有要求他们不要签字。

公开信与另外一起几个月之前发生的抗议信相呼应，那封信中也使用了“新闻工作者权利”的字眼。3月7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期间，一位记者在会场外请湖北省长李鸿忠评论邓玉娇事件。这是一个政治敏感问题，邓玉娇是湖北的一位女服务员，她在2009年5月的审判中为自己辩护，她说刺伤当地一位官员是因为受到这位官员性攻击。邓玉娇在网上成了反抗暴力的象征，最后被当地法院无罪释放。

对于记者的提问，李挑衅性的回答（你是哪个媒体的？）并抢走了记者的录音设备。数天之内，1000多位新闻工作者和学术界人士签署了一封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公开信，认为这是侵犯专业工作者权利的事件。该公开信说，“强夺[录音机]事件，受害者绝非当事记者一人。媒体权利折戟，大众知情权受挫。”公开信作者将此事与更加暴力的邓玉娇案相提并论，称当时湖北的领导人“监视、殴打、驱赶记者，不惜牺牲法治以遮掩官员颜面。”

在其后接受当地媒体采访中，李拒绝道歉。审查机关将此事的讨论限制在主流媒体范围之内。据*纽约时报*报道，*财经*杂志发表的文章，包括援引一位前人民日报副总编和前中宣部新闻主管对李谴责的文章，都被从网站上撤出。虽然政府极力限制，但网络上讽刺李的漫画却在广泛传播。据设在美国的新闻网站*中国数字时代*报道，一位网路用户设计了一件妇

女T恤衫，上面写着“不要抢走我的录音机”的标语。

新闻工作者对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除了促进公众对相关事件了解外，这两封公开信还有助于增强媒体的集体感。他们说，对此举已经给同事与他们的雇用单位传递了信息持乐观态度。其中一位说，如果记者碰到麻烦，“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报纸沉默无语。而公开表态并鼓励其他人采取同样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媒体对敏感案子沉默无语

新闻媒体沉默无语正是一家维吾尔网站编辑被捕所碰到的情况。7月23日，穆斯林占多数的西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法院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判决海来特·尼亚孜(Gheyret Niyaz)15年的监禁。尼亚孜是报道维吾尔问题为主的中文网站 *维吾尔在线* 编辑。

尼亚孜为人温和、并不主张维吾尔成为独立的国家。他是在2009年10月1日当地民族骚乱事件后被捕的，他在互联网上报道此事件，并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据 *美联社* 报道，审判中检方把他撰写的文章当作证据。

此判决非常敏感，难以获得主流媒体报道或者新闻界支持。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也对此保持沉默。香港中国媒体项目计划的陈婉莹在网站上撰文说，“对海来特案的报道，来源除了网上媒体个人博客和西方人权团体之外，还有澳洲广播电台、德国之声电台等外国媒体。”在中国国内，一群敢于直言的律师和学者在海外网站上发表公开声明，支持海来特。他们表示，“我们认为，海来特等新闻工作者因言获罪，与‘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权利’的宪法承诺相违背。”

当新闻工作者在仇子明拘捕与霸王的冲突正获小胜之际、海来特被判决六天之后，据公益组织美国维吾尔人协会援引其中一名当事人哥哥提供的信息，乌鲁木齐一家地方法院也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判决该网站另外三名站长3年到10年刑期。与此前类似诉讼程序一样，法院并不公开证实对上述三人的判决。国内新闻媒体实际上并没有报道这类案子。

由于这些维吾尔编辑们不是在官方承认的媒体工作，政府不承认他们是新闻工作者。一些中国新闻工作者正为谁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业是否应该超越官方媒体这样的基本问题而困扰。《南方都市报》8月2日的专栏文章指出，“只要记者证由政府发放，且只有持记者证的人才能进行新闻采访活动……，媒体之外的普通人进行采访和新闻报道就会被完全排除在外。”

但是扩大新闻定义却是与政治改革这一更大的问题密切相关的。

就如媒体权利一样，中国媒体经常讨论政治改革，但这种讨论主要根据政治领导人的暗示进行，不久前8月就有一个例证。据当地媒体报道，在庆祝根据邓小平指示建立的深圳特区—中国经济成长中的一个里程碑--30周年的讲话中，温家宝提到要“推动政治改革”及经济改革。他说，这些政治改革必须保护人民的“民主与合法权益”。

香港大学中国媒体项目计划一直在追踪政治改革及其与新闻的关系。该中心指出，一些新闻工作者表示，通过报道温家宝的讲话，可以推动整个改革的讨论，这种情况通常被称为“借题发挥”。该中心还说，一位评论家在微博上写到，“不管温是什么意思，我们借机讲我们的意思。胆大的，直接讲，胆小点的，以响应温的讲话的名义讲。”

预期在2012年秋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18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包括胡锦涛和温家宝等现任领导人将会退休。一些新闻工作者和分析师期望，新一代的领导人能够将美好的诺言变成制度改革。但很多人认为，新的共产党领导人不会采取任何减少中央政府权威的、有意义的体制改革。

一个迹象表明，未来几个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党的领导人可能通过允许新闻工作者现在自由发表报道和评论，以创造有利于广泛政治改革的条件。通过一方面推进表面上的媒体权利，而另一方面则严格限制媒体，他们传递出的非常不同的政治讯号就是，其允诺改革的唯一条件是必须维护共产党的权威。